中国贸易报
CHINA TRADE NEWS

■ 2011.11.29 ■ 星期二
■ 主编：何秀芳 ■ 执行主编：刘 宇
■ maoyibao_shz@126.com ■ 95013812345－1210
■ 编辑：高洪艳 ■ 制版：董童

现代服务业

主办：中国贸易报社 协办：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X1

率先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 全力推进“部市合作”机制

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频现“政策市”

■ 本报记者 何秀芳 刘 宇

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在上海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全面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之际，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号召之时，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又迎来了重大的政策利好。

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开展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试点，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开展试点，条件成熟时可选择部分行业在全国范围进行试点。11月16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在沪试点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同时还印发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和《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明确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并对试点范围、征税对象、计税依据、适用税率、过渡政策、征收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改革试点的主要内容是：在现行增值税17%和13%两档税率的基础上，新增设11%和6%两档低税率，交通运输业适用11%的税率，研发和技术服务、文化创意、物流辅助和鉴证咨询等现代服务业适用6%的税率；试点纳税人原享受的技术转让等营业税减免税政策，调整为增值税免税或即征即退；现行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试点纳税人购买服务，可抵扣进项税额；试点纳税人原适用的营业税差额征税政策，试点期间可以延续；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仍归属试点地区。

这是继2009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之后，货物劳务税收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也是一项重要的结构性减税措施。改革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对货物和劳务分别征收增值税与营业税所产生的重复征税问题，为上海“十二五”期间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提供良好的财税政策支撑。

目前，在部市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加大国家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立足国家战略，推动先行先试，以务实的工作作风，取得各项工作新的突破，已成为上海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在沪揭牌

日前，国内第一家以“政府推动、企业运作”模式运营的文化公共服务平台——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正式更名为“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旨在利用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有利条件，利用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政策和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特殊优势，通过提供资金支持、资源整合、平台搭建等措施，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国外优秀文化“引进来”提供传输中转的通道。基地除进行文化产权交易、利用保税区特殊的监管政策，开拓艺术品保税展示业务外，还将在文化部的指导下创建国家文化贸易政策研究中心，成立国家对外文化贸易信息中心，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贸易政策、海外文化产业和市场的发展特征、环境、国内外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为文化企业提供咨询服务，解析“走出去”的政策壁垒，并提出有效对策和战略指导。

在11月18日举行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揭牌仪式上，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表示，希望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能够积极发挥先行先试作用，不断开拓创新，有效发挥平台服务企业、降低成本、吸引人才、促进合作、推动发展等功能，强化措施，狠抓落实，切实发挥好基地的助推作用，推动中华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向世界市场。

上海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启动

10月21日，财政部、商务部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上海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合作协议，并在沪举行上海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启动仪式。经财政部、商务部同意，上海将在浦东新区、虹桥商务区及浦江沿岸进行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试点。力争经过3年至5年的试点，带动试点区域服务业现代化、网络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促进上海服务业的跨越式发展，同时探索突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瓶颈，为全国服务业发展积累经验。据介绍，试点工作拟选择城市共同配送、现代商贸服务功能区和国际贸易中心公共平台等上海有基础、有优势的领域予以重点支持。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共建机制初步形成

目前，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良好氛围和共建机制已初步形成，一批国家级贸易促进平台项目正在积极推动中。今年8月，商务部和上海市确定了2011年部市合作20项重点工作。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指出，上海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是国家战略，从长三角和全国贸易发展来看，需要上海起到引领作用，希望上海在国际技术贸易、新型商业模式、物流业发展等方面起到示范作用。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完善部市合作机制，与上海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发展中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发展贸易的新模式。

数字出版产业高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在新闻出版总署与上海市政府携手建立的部市合作机制的有力推动下，上海积极推动新闻出版产业特别是数字出版产业高地建设，3年来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创新，取得了明显成效，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2010年，全市数字出版产业销售收入超过22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占上海新闻出版总产值（988亿元）的22.27%，占全国数字出版总收入近20%。张江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总产出达到110亿元，成为全国首个突破百亿元的基地。

7月27日，新闻出版总署—上海市政府部市合作第四次联席会议在沪召开。会议期间，上海市新闻出版（版权）局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签订了《共同推进数字化课程环境建设和学习方式变革试点》战略合作协议书，三方将合力重点推动“电子书包”在上海虹口区试点的建设工作。

探索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机制

7月3日，卫生部、上海市政府在上海举行了部市会商会议并共同签署了《卫生部、上海市人民政府进一步深化部市合作协议书》及《共建共管在沪卫生部管理单位补充协议》。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卫生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签署卫生合作协议，积极研究共同关心和面对的医改等重大问题，探索新形势下地区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新模式和新机制，争取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为全国医改工作探索道路。

聚焦与整合 激活上海科技创新能力

早在7年前，科技部就与上海市政府签署了工作会商制度议定书。6年前，双方正式启动部市合作工作，上海成为最早一批与科技部形成会商制度的省市之一。同时，科技部也是第一个与上海市建立部市会商机制的国家部委。几年来的部市合作，始终围绕服务国家战略、服务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两大目标，聚焦重大攻关项目，聚焦创新基地建设，聚焦创新创业环境建设，整合各方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攻难关，逐渐形成上海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载体，科技支撑引领城市未来发展的能力也得到提升。部市合作，成效显著，已成为上海科技“十一五”中最重要、最绚丽的篇章之一。科技部和上海市明确自2010年至2015年，双方将围绕“十二五”时期国家战略和上海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有效集成国家和上海的科技创新资源，重点推进5个方面的工作。

科技部与上海市政府将共同建设上海技术交易中心，使之成为全国性的技术流通中心、技术要素市场的主要服务平台；并继续深入推进园区发展，把张江高新区建设成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推进杨浦国家创新型城区试点工作，深化大学校区、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三区融合，联动发展”的核心理念，促进科教资源密集区和老工业基地的转型发展。

共建国家现代民政示范区

根据去年国家民政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建设国家现代民政示范区合作协议，国家民政部将着重从8个方面与上海加强合作：一是建立健全科学的社会救助机制；二是推动普惠型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发展；三是改革社区管理体制与服务机制；四是创新社会组织发展模式；五是推进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设；六是提升社会事务管理与社会服务水平；七是加强现代科技和标准应用；八是完善现代民政发展的保障机制。

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

去年下半年，上海市闸北区率先成为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国首批37个“国家现代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之一。“以工业园区转型和功能集聚区建设为重点”的试点方案，得到国家发改委专家的一致认可。目前，全区23个都市型工业园区实现再转型，100公顷老工业土地资源将进一步整合利用开发，闸北将在29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精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今后，国家和上海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有关政策也将在闸北先行先试。

高端访谈

完善我国服务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组书记周振华

■ 周振华

世界级城市群是服务经济集聚发展的主要载体，而服务经济的发展水平则是体现城市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长三角世界城市群作为一个世界城市区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平台。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任务就是大力提升这一区域的服务经济水平，增强在国内和国际的辐射能力。

目前，无论是从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基础设施建设来讲，长三角地区发展服务经济的物质基础和条件都已初步具备。现在，发展的主要瓶颈在于制度环境。所以，长三角区域服务业的合作与发展最主要的是突破制度环境的制约。

服务经济要求建立与此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都有与其相适应的特定的制度环境。工业经济环境的完善有利于促进工业经济的发展，但是，完善工业经济的制度环境却难以适应服务经济的要求。

服务经济是以知识、信息和智力要素的生产、扩散与应用为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以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法治和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建立在服务产品的生产和配置基础上的经济形态。因此，服务经济有区别于工业经济的形态，有它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性。更主要的在于，服务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形成的一种主导性的经济形态，服务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和它发展特殊性规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

从国际来看，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服务经济将逐步登上舞台成为主导性经济形态，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现S形的阶段性变化特征。

服务经济与工业经济的演进机制、方式、路径有很大的区别。服务经济由多种机制交融演进而成：一是分工深化：内置服务活动外部化、市场化（服务外包）。服务经济和工业经济的分工深化区别在于，工业经济通过横向的产业链，分上中下游；但是服务经济的分工往往表现为原来很多在制造业或者是服务业内部的服务活动外置化、市场化，它的产业链不是横向的，而是平面的，本身的产业链很简单，但是面向的对象很广泛。二是产业转化：就是服务活动取代非服务活动成为主导，包括很多制造企业现在都转型为服务企业，例如，很多钢铁企业现在都在转型为服务企业。三是产业融合：包括二产、三产之间的融合，包括三产之间的融合，形成了新的服务功能、新的业态、服务新集成。四是产业突破，拓展服务供给的范围及可交易性，形成规模化的定制、远程服务等等。

从服务经济的结构来看，一是主导产业转型升级趋势很显著，有些产业是下降的，有些服务业产业是不断上升的；二是生产型服务业和知识型服务业将成为服务经济发展的龙头；三是政府和非营利性组织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规模来讲其就业人数大约将占到服务业的1/3份额；四是服务业投入中无形资产比重迅速增加。

正因为服务经济和工业经济有比较大的区别，所以服务经济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更高层次的需求。服务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由此带来经济运行中市场主体之间更为复杂的合作联系和更为多样的交易关系，再加上服务活动本身具有的高度信息不对称、事后评价等特征，决定了服务经济的发展需要更为严谨、高效的交易制度，更加规范、严格的商业规则和服务标准，以及更加有效、公正的法治环境。

服务经济发展虽然也需要现代交通通信设施、便捷的交通网络、物美价廉的物质产品和优美和谐的人居环境等物质要素，但更多的是依靠信息、知识、技能、品牌、管理、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更多依靠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因此，服务经济的发展更加注重高级要素的配置方式和效率，需要促进创新、创业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并以此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服务经济发展对制度环境的要求

服务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分为3个层次，一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包括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产权制度自由有序的市场交易与竞争制度、高效的有限政府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等；二是基本的管理制度，包括税收、信用、监管、准入、统计等；三是行业管理制度。

服务经济对制度环境的总体要求可以归纳成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创新化，这里仅讲市场化。市场化与服务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市场化程度被提高一个百分点，会引至服务业上升0.91个百分点。

具体从基本管理层面来讲，服务经济发展对基本管理层面的要求是：对税收制度来说，要有利于分工深化、产业融合、集聚人才与激励创新、促进服务贸易；对信用制度来说，要求征信体系的统一与完善、征信监管有力、行业自律、信用奖惩机制更加完善；对监管制度而言，要求综合化、谨慎高效化、透明化、便利化；对准入制度来讲，要求反垄断、适时开放、降低门槛、弹性化；对统计制度的要求，是全面、准确地反映服务业的活动及其产出情况，具有结构弹性的分类统计体系。

国内做过一个调查，服务行业当中不同的行业对上述所讲的税收、准入、监管等敏感度是不一样的。

我国服务经济发展制度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服务经济发展从总体来讲，一是市场化程度偏低，根据国际标准测算，目前我国市场化程度是50%，在全世界130个国家中位列113位，（这是4年前的数据，现在可能会明显提高）；二是服务领域开放度不够，存在各种行政性的垄断；三是服务领域的市场配置功能相对较弱；四是服务领域的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五是服务领域的收入分配制度尚不完善。

从基本管理制度来分析，先看一下税收制度。

第一个问题是，现行的税收制度设计更加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不利于调动各方面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以生产性增值税为主，地方政府税收主要来自生产环节。财权和事权不匹配，迫使地方倾向发展税收多的制造业。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很多发达地区服务业税收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

第二个问题是，税种的设置不合理，导致服务业税收负担比较重，增值税改革以后制造业在流转税方面的税收负担大约为3%，而服务业流转税主要是营业税。由于缺乏进项抵扣规定，税收负担仍在5%以上。制造业实行增值税，服务业实行营业税，也使得增值税的链条断裂，断裂造成的后果是不利于制造业内部的服务活动外置化分离出来，也不利于服务外包。

第三个问题是，个人所得税方面存在税负水平比较高、重复征税等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缺乏税收优惠政策的导向。

从信用制度来讲，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信用信息共享困难，信用服务市场存在严重的供需不足，缺少必要的信用相关的法律法规，征信行业监管有待完善，公共征信机构与商业性征信公司的职业分工与定位不明确，包括公安系统个人信息平台也不是互相共享的。

从监管制度来讲，存在的问题是多头监管、条块分割、交叉监管，部分行业监管缺乏公正性和透明度，监管机制僵硬，社会化管理手段严重不足，监管缺失与监管过度并存（主体监管与事前监管）。最明显的例子是现在金融企业里面的“一行三会”分头监管，但是金融发展是混合经营，包括网上金融支付到底是由谁来监管依然无法界定。

从准入制度来看，主要是对外开放度比较低，社会服务业和公众服务开放比较缓慢，肯定式目录、工商注册登记进入门槛比较高，所以现在很多新兴的服务业态登记注册就成为问题。另外，我国的服务经济也存在行业垄断、市场分割、服务标准缺失等问题。

从统计制度来讲，现在分类统计没有覆盖到以网络为依托的新兴产业，像无店铺销售、远程教育，现在都无法纳入统计，而且现行的分类统计也落后于产业融合的新趋势，对服务外包、创意产业、工程、产品维护都有很多遗漏。现行的分类统计受到不适宜的制度因素如行业归属管理体制、税收体制、政策导向等的影响。

当前，对我国服务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前三大类因素分别是制度环境（市场经济体制）、政府职能和行业监管。总体来看，现在制度的框架对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制约作用是最强的，其次是研发、设计、计算与信息服务，相对来说，消费性的服务、商业和商务服务、物流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弱一点。

（下转X3版）